

深层贸易协定的第三方效应： “贸易转移”还是“贸易溢出”

李 潇 韩 剑*

摘要：伴随区域贸易协定规则日益深化,大量触及缔约方内部规制的条款塑造了影响第三方贸易的新型渠道,对经典的贸易转移理论带来挑战。本文围绕中国的区域贸易协定网络,使用2002—2020年中国出口产品数据,实证检验了区域贸易协定及其深度对中国与第三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深层区域贸易协定对第三方贸易产生了不同于贸易转移的新型溢出,并通过区域贸易协定伙伴与第三方之间的空间、需求、制度和贸易协定规则联系进行扩散。这种溢出效应源于深层区域贸易协定促进了经济体间产品监管规则融合、降低了对国际贸易的实质性阻碍,具备了有助于国际贸易的公共利益。并且深层协定的正面溢出效应在WTO-X和WTO-plus的具体条款中均有显著表现,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表现得更加突出。研究发现有助于从第三方视角理解深层区域贸易协定的溢出效应,为中国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扩大制度型开放提供全新的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深层贸易协定;第三方效应;贸易转移;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4

一、引言

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的显著特征集中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动力不足与全球非贸易问题大量爆发。环境污染、人口失衡、数字鸿沟等放大了各经济体在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深层差异,加重了国际贸易的悲观前景。全球开放合作的主要渠道由WTO多边贸易磋商框架转向具有灵活性和地域性优势的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各经济体积极利用RTA制定新一轮高标准经贸规则,促使RTA呈现出水平深化与垂直深化的新型特征(铁瑛等, 2021)。高水平RTA不仅通过削减贸易壁垒提高了区域内的贸易水平,还通过引入竞争、知识产权和监管等“边境后”规则强化成员义务(Mattoo et al., 2017),引导经济体内政策制定、协调国际规制差异(Ridley, 2018),对非成员

*李潇(通讯作者),南京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210008,电子信箱:dg21020012@smail.nju.edu.cn;韩剑,南京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210008,电子信箱:hanj@nju.edu.cn。

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贸易与投资协定网络及影响研究”(23JJD79000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标准制度型开放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机制、路径与对策研究”(72473064)的资助。本文系《经济评论》第九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青年学者论坛优秀论文,作者感谢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产生有别于“贸易转移”的积极影响(Baldwin, 2014)。高水平 RTA 对国际贸易的多重影响渠道及对区域内的福利分配,成为国际经济学需要作出机制论证和经验解释的重要命题。

通过高水平 RTA 接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是中国释放外贸深层动能、实现出口增质升级的重要方式。然而,中国在此过程中却面临着“规则”和“网络”的双重瓶颈。一是中国加入 WTO、开启 RTA 战略的时间相对较晚,在高水平 RTA 以“美式”与“欧式”模板为主流的趋势下,短期内中国的国内贸易政策、标准、制度等规则架构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还存在一定的距离,需要继续加强与美欧等重要贸易伙伴之间的高水平国际合作;二是世界各国积极参与构建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全球治理竞争激烈,中国从对垒者向引领者的转变过程艰巨。提升 RTA 规则标准、构建高水平 RTA 网络,在激烈的规则竞争中提出更加包容多维的“中式”方案,是中国作为全球贸易稳定器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

基于此,本文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关注高水平 RTA 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理论上,本文检验深层 RTA 对非成员方产生的不同于贸易转移的溢出效应,从空间、需求、制度和 RTA 规则四个维度总结溢出效应的扩散形式,基于产品监管规则融合与等效的角度廓清溢出效应的机制渠道,结合行业特征与重点规则条款对深层 RTA 的第三方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为传统关税同盟理论与 RTA 理论做出一定的边际拓展;现实上,本文以中国、中国 RTA 伙伴及第三方搭建分析 RTA 效应的三方框架,使用 2002—2020 年中国与 200 个第三方的 1 241 种 HS4 分位产品贸易数据,同时关注中国生效 RTA 的原生影响与基于 RTA 伙伴延伸的次生影响,更加细致、综合地考察中国 RTA 战略的多方位影响,为中国推动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构建符合外贸发展与实际需求的国际化、高标准的 RTA 网络提供全新思路与视角。

二、文献综述

本文关注 RTA 持续深化背景下深层贸易协定对第三方贸易的新型溢出效应,虽然 RTA 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关税同盟理论和 RTA 异质性条款的域内影响已有丰富的成果,但结合 RTA 内容范围与规则深度变化,对深层 RTA 的第三方效应的研究仍属少数。

从早期对于 RTA 影响效应的研究来看,基于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理论占据了主流观点。这些观点从贸易壁垒削减的视角指出,RTA 引发区域内的贸易成本与不确定性风险的相对变化造成对第三方的贸易转移至成员之间,促使成员间产生贸易创造、形成规模经济、引发技术创新等(Viner, 1950);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行业游说程度(Panagariya and Findlay, 1996)、关税调整类型(Freund, 2011)以及 RTA 的地区和时期差异(Musila, 2005)等可能低估贸易转移效应,但这些文献仍未脱离贸易转移理论的分析框架,仅就贸易转移的强度与显著性进行了讨论。整体而言,这类研究重点关注的是 RTA 生效前后关税降低引发的区域内贸易成本变化,普遍基于 RTA 的同质性假定,尚未根据 RTA 文本内容、规则范围及具体议题等异质性特征展开分析。

伴随 RTA 的逐步深化,对 RTA 异质性条款的研究开始涌现。一部分学者根据贸易协定文本内容识别了 RTA 的深度变化(Horn et al., 2010),构建了 RTA 深度量化指标,指出现代 RTA 已经由关税自由化扩大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监管等问题(Hofmann et al., 2017; Dür et al., 2014),具备了与早期 RTA 不同的异质性特征,不仅从整体对国际贸易产生预期、短期和长期影响,还以其条款差异对国际贸易具有不同效应(Kohl et al., 2016)。另一部分学者

围绕数字贸易(周念利、陈寰琦,2020)、知识产权(陈迁影、刘志中,2024)、政府采购(韩剑、郑航,2022)、环境(韩剑等,2022)等重点议题对贸易的影响效应展开讨论,从贸易流量、价值链贸易、产品质量(杜莉、董玥,2022)及出口二元边际等角度证实了边境内规则对贸易的改善作用,指出不断深化的 RTA 通过促进区域内标准统一(Chen and Mattoo,2008)、涵盖公共利益条款(Mattoo et al.,2017)、影响边境内制度改革(Ridley,2018)等渠道在成员间形成有助于国际贸易的边境后制度,以此解决成员间的协调问题、实现更大的 RTA 网络,从而对第三方产生正外部性(Baldwin,2014)。

然而,在有关 RTA 异质性条款的讨论中基于第三方框架检验 RTA 效应的研究尚属于探索阶段,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文献有 Baier 等(2014)、Lee 等(2023)。以往研究一般假定第三方与 RTA 成员不存在其他 RTA 联系,而 Baier 等(2014)考虑了第三方与既有成员可能形成新的 RTA 关系,总结了第三方驱动下经济体缔结新型 RTA 关系的两种典型效应,从 RTA 缔结动因中拓展了第三方效应的分析框架。Lee 等(2023)将企业来源地限制为 RTA 之外的完全第三方,在 Morales 等(2019)“扩展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 RTA 规则相似性,与地理位置、语言和人均收入等共同作为企业先后出口国(地区)之间的“扩展引力因素”,强调深层贸易协定可以使成员在监管规则上趋于一致,从而降低整体区域的进入成本并增加第三方企业进入和参与区域内出口的概率。

以上研究表明,现代 RTA 因其异质性特征对贸易存在差异化影响,在协议范围扩大、条款约束性加强的趋势下,现代 RTA 由降低关税的边境规则覆盖到边境后规则领域,且边境后规则不断强化了成员的履约义务,引发成员的内部制度改革(Ridley,2018)。因此,深层 RTA 可能突破原有的、基于边境规则的贸易转移效应的限制,对第三方产生新型经贸规则下的贸易溢出效应。但目前从第三方视角下讨论深层 RTA 影响效应的研究仍属少数,影响渠道尚未厘清,量化检验尚不充足,有鉴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存在以下三点:第一,研究视角上,本文聚焦第三方视角下的深层 RTA 溢出效应,借鉴 Baier 等(2014)的第三方效应框架,以出口国(地区)作为第三方、以中国的 RTA 伙伴作为中间方,基于 RTA 的异质性假定,在 Lee 等(2023)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一国(地区)与第三方存在共同 RTA 伙伴情况下,RTA 及其深度变化对第三方贸易的影响;第二,研究内容上,本文检验了溢出效应在空间、需求、制度及 RTA 规则深度上的扩散形式,参考 Lee 等(2023)的方法将中国 RTA 伙伴与第三方之间的地理位置、社会文化、市场需求、经济制度以及 RTA 规则深度等共同作为扩展的引力因素;第三,研究方法上,本文认为深层 RTA 通过协调国际规制差异、降低第三方在 RTA 区域内实质性贸易成本塑造了溢出效应的影响渠道,使用中国 2002—2020 年第三方-产品层面的出口面板数据,利用产品监管负担与贸易关注水平进行机制检验,结合行业特点与部分重点规则条款进行异质性分析,为评估中国 RTA 战略布局的综合影响提供经验数据支撑。

三、理论机制分析

RTA 的深化特征影响第三方贸易。在 RTA 的同质性假定下,以关税同盟理论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 RTA 相对提升了第三方的贸易成本,对区域外国家和地区产生贸易转移。在 RTA 的异质性假定下,协定议题的持续深化与扩大突破了只关注双边关税自由化的理论逻辑,根据 RTA 内容设计的覆盖领域和严格程度可以区分为浅层 RTA 和深层 RTA(Baier et al.,2019)。浅层 RTA 侧重于降低成员之间的关税壁垒,因而对第三方造成贸易转移;深层

RTA 不仅降低关税水平,还可以降低关税之外的贸易成本和歧视(Baldwin, 2014)。后者可能来源于深层 RTA 涵盖了更多的边境后条款,尤其当 RTA 在涉及监管竞争政策、补贴和标准等条款时,其公共利益特性更加突出,将对所有贸易伙伴产生影响(Mattoo et al., 2017)。具体而言,深层 RTA 通过设置边境后规则,赋予成员履约义务,成员除了满足 WTO 传统义务之外需要让渡更大的经济主权和提高市场开放程度,降低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制度约束。例如成员需要修改内部法或制定符合高标准贸易规则的政策措施达到高标准 RTA 的要求,而这种改革后的贸易政策同时适用于与该经济体产生贸易的 RTA 成员及第三方的产品与企业,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这种“贸易协定-境内法-国际贸易”的特殊传导机制下,各经济体由于内部制度差异造成的贸易协调问题得以部分解决,构建起有助于国际贸易的公共规则并实现更广地理空间的市场整合,因而产生“公共利益”,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边境间条款引致的第三方贸易转移,对第三方具有“贸易溢出”。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 RTA 深度影响第三方贸易,浅层 RTA 抑制第三方贸易,而深层 RTA 对第三方贸易产生正外部性。

国家(地区)间相似程度影响国际贸易,使其产生路径依赖。根据扩展引力模型的观点,出口商在国际市场中建立销售网络时,需要在搜寻出口国(地区)市场信息、熟悉社会文化与法治环境、开展新的贸易活动等方面付出大量成本,出于成本最小化的目的,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共同特性的出口市场。这些相似因素被视作“扩展引力因素”,例如地理空间、社会环境和市场需求等(Morales et al., 2019)。在 RTA 的视角下,RTA 提高了成员间的贸易政策相似度,构成与空间、需求、制度等相同的“扩展引力因素”。从第三方框架来看,若 RTA 伙伴与第三方存在其他生效 RTA,则出口商通过 RTA 伙伴不仅将获得关于第三方的交通运输、信息沟通、市场需求、社会文化、法律制度等信息,还将获得关于第三方的贸易政策信息。且 RTA 的深度越大,RTA 伙伴与第三方贸易政策信息的准确度和一致性越强,有助于降低出口商面向第三方市场出口的不确定性风险和贸易成本,帮助出口商预先生产符合出口标准的产品,改变品牌、标签和包装,调整产品销售策略等,进而促进与第三方的出口贸易。故深层 RTA 对成员的福利效应将沿着扩展的引力因素辐射第三方,深层 RTA 的第三方溢出效应具有空间、需求、制度和 RTA 规则等扩散形式。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2。

假说 2: RTA 伙伴与第三方的空间、需求、制度和 RTA 规则联系将影响第三方贸易,使 RTA 产生空间溢出、需求溢出、制度溢出和 RTA 规则溢出。

深层 RTA 通过推动各经济体对产品的技术标准、法规、合格评定等监管规则的趋同与融合促进第三方贸易。为减少对本土生产商的冲击同时保证产品质量合格、符合市场需求,各经济体对进口产品设置了严格的非关税措施。特别是对于与国家安全、居民健康、环境保护等紧密相关的芯片、软件、食品、医药等产品的监管要求更高,经济体间差异也相对较大,构成了关税自由化背景下产品跨境成本的主要来源。许多经济体出于权力竞争或防范过当采取过度严苛的监管措施,如大幅升级《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与《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SPS)的非关税措施,突破了 WTO 框架下“透明度、科学性、合理性、符合国际标准”的约束,出现与全球化和自由化相悖的行为。这些现象提升了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遭遇严格监管的不确定性风险,对国际贸易造成非必要障碍,部分引发了出口国(地区)的贸易特别关注。而针对产品技术标准、法规、合格评定等非贸易措施,国

际间协调日益成为高标准 RTA 的重要内容(郑休休等,2023)。通过签署深层 RTA 将原本推广国际标准的鼓励性规定提升至成员义务的高度,引导成员出台与国际标准一致的监管政策并保障其变动控制在有限、合理的范围内,使其达到预期目的而减轻对国际贸易的阻碍,促成了不同经济体对产品监管规则的等效、透明和稳定。此时,RTA 产生的市场整合降低了产品在监管趋同的一体化市场中的适应成本,减轻了国际贸易的实质性阻碍,强化了 RTA 对第三方的溢出效应(Lee et al., 2023)。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3。

假说 3: 深层 RTA 通过推动产品监管规则的国际协同、降低对国际贸易的实质性阻碍对第三方产生正向溢出。

深层 RTA 的溢出效应受行业技术特点与协议内容等影响存在差异。一方面,相较于其他行业,高新技术行业中深层 RTA 的溢出效应可能更加明显。深层 RTA 具备高水平、高标准的规则特点,整合后的成员标准一般高于原有水平,原本不同标准的成员需逐步对接新型规则,而这一调整过程影响了国际贸易结构,对出口产业中的技术含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出口(王黎莹等,2022),对电子商务、数据流动和信息通讯等新兴行业和领域可能具有更强的影响。另一方面,深层 RTA 条款由于内容差异,经济体的接受程度、规则成熟度和执行性等可能影响第三方溢出效应。RTA 的第三方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协议的具体内容(Baldwin, 2014)。按照 WTO 的当前授权范围,RTA 中的具体条款可以分为与贸易自由化相关的 WTO-plus 条款以及尚未受到 WTO 监管的 WTO-X 条款。在 WTO 多边框架的长期影响下,WTO-plus 条款的成熟度较高、执行性较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更加直观,而 WTO-X 条款一般难以在 WTO 框架下达成共识,但更有助于推动经济体深度融合,需要在 RTA 中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逐步推进,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相对间接且深远。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4。

假说 4: 行业技术特点与协议内容对 RTA 的第三方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

四、数据、模型与变量选取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包括:(1) CEPII 数据库^①,该数据库提供了估算引力方程所需的国家(地区)双边贸易流量、地理距离、贸易便利化措施、宏观经济指标等指标和数据;(2) WTO 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②,该数据库提供了全球范围内绝大部分 RTA 的详细信息;(3) 贸易协定设计(DESTA)数据库^③,Dür 等(2014)基于 RTA 协定文本中关于关税减免、服务、投资、标准、政府采购、竞争政策以及知识产权的 7 个关键条款构造了贸易协定深度指数;(4) 世界银行深度协议数据库^④,该数据库基于 Hofmann 等(2017)的方法构建了涵盖 1958—2021 年签署的 381 个 RTA 深度指数;(5) 国际国家风险指南^⑤(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ICRG),该数据提供了全球 146 个经济体的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指数。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1) 参考 Baier 等(2014)、铁瑛等(2021)的方法,将

①数据来源: http://www.cepii.fr/CEPIL/en/bdd_modele/bdd_modele.asp。

②数据来源: <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③数据来源: <https://www.designoftradeagreements.org/downloads/>。

④数据来源: <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search/dataset/0039575/Content-of-Deep-Trade-Agreements>。

⑤数据来源: <https://www.prsgroup.com/explore-our-products/icrg/>。

RTA 降维至经济体对层面,提取中国生效的 16 个 RTA 与 26 个 RTA 伙伴信息、中国 RTA 伙伴生效的 173 个 RTA 与 129 个第三方伙伴信息(不含中国),形成包含协定名称、生效时间、深度指数等在内的分别用于描述中国生效 RTA 和中国 RTA 伙伴生效 RTA 的两个年份-经济体对-生效 RTA 层面的数据集;(2)使用以上两个数据集,将 26 个中国 RTA 伙伴作为中间方,匹配中间方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 RTA 规则关系、引力关系、需求关系与制度关系^①,生成年份-国家(地区)层面的数据集;(3)使用 2002—2020 年的中国-第三方 HS4 分位产品出口数据,将第二步完成匹配的年份-国家(地区)层面的数据集按照第三方进行二次匹配,最终得到年份-产品-第三方层面的面板数据,涵盖中国的 200 个第三方^②、1 241 类产品 19 年的贸易数据。

(二)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1. 基准模型

本文使用引力模型进行基准回归,评估 RTA 对中国与第三方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ln export_{jpt} = \beta_1 X_{jt} + \alpha_j + \gamma_p + \theta_t + \varepsilon_{jpt} \quad (1)$$

(1)式中:被解释变量 $\ln export_{jpt}$ 为中国在 t 期对第三方 j 出口产品 p 的贸易流量自然对数。解释变量 X_{jt} 分别从以下三个角度衡量:

(1) $RTA_dum_{jt} = \max_k \{CHNRTA_{kt} \times RTA_{jkt}\}$, 表示 t 期中国生效 RTA 使中国与第三方 j 存在共同 RTA 伙伴的虚拟变量。其中 k 表示中间方, $CHNRTA_{kt}$ 与 RTA_{jkt} 分别表示 t 期中国与中间方 k 、中间方 k 与第三方 j 之间存在生效 RTA 的虚拟变量。

(2) $RTA_num_{jt} = \sum_k CHNRTA_{kt} \times RTA_{jkt}$, 表示 t 期中国生效 RTA 使中国与第三方 j 存在共同 RTA 伙伴 k 的数量。样本期间内中国与第三方的共同 RTA 伙伴数量不断增加,以中美为例,自 2005 年中新 FTA 生效以来,到 2020 年中美共同 RTA 伙伴数量已达 6 个(新加坡、哥斯达黎加、秘鲁、韩国、智利、澳大利亚)。

(3) $CHNRTA_dep_{jt} = \left(\sum_k RTA_dum_{jt} \times CHNRTA_dep_{kt} \right) / RTA_num_{jt}$, 表示 t 期中国与第三方 j 的共同 RTA 伙伴之间生效 RTA 的平均深度变量。 $CHNRTA_dep_{kt}$ 为 t 期中国与中间方 k 之间生效 RTA 的深度变量。本文使用 DESTA 数据库中基于 Rasch 模型计算的 RTA 深度作为基准实证中的测度指标。

以上三个变量均表示以共同 RTA 伙伴为桥梁中国与第三方的关系,其系数表示中国生效 RTA 对中国向第三方出口贸易的影响。但 RTA_dum_{jt} 和 RTA_num_{jt} 只能捕捉 RTA 的生效与数量信息,包含浅层和深层 RTA 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其系数中无法分辨深层 RTA 的影响;而 $CHNRTA_dep_{jt}$ 保留了中国生效 RTA 的深度信息,它的系数表示深层 RTA 及其深度对中国与第三方贸易的影响,是本文考察深层 RTA 影响效应的重要依据。考虑到深层 RTA 塑造边境后特征发挥作用,比边境间降税措施的时效性更长,本文在基准回归中还纳入了滞后两期进行估计。

此外,本文加入 α_j 、 γ_p 、 θ_t , 分别为第三方、产品、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用以控制遗漏变量

^①为保证各项指标系数的可比性,本文预先对国家之间的 RTA 深度、地理距离、进口相似性、风险指数等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取值范围为 $[0, 1]$ 之间。

^②为避免中国与第三方之间存在 RTA 对结果造成偏误,本文在实证分析中逐年将中国 RTA 伙伴从第三方中剔除。

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ε_{jpt} 表示残差项。

2. 扩散形式与扩展的引力模型

本文借鉴 Lee 等 (2023) 的思路将引力变量引入中国 RTA 伙伴与第三方之间。假设 RTA 伙伴与第三方 j 存在空间、需求、制度或 RTA 规则方面的联系,出口商通过 RTA 伙伴获得第三方 j 的有效信息,降低向第三方市场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和贸易成本,影响中国与第三方 j 的贸易。基于此,拓展模型如下:

$$\ln export_{jpt} = \beta_1 X_{jt} + \beta_2 space_{jt} + \beta_3 demand_{jt} + \beta_4 regular_{jt} + \beta_5 RTA_dep_{jt} + \alpha_j + \gamma_p + \theta_t + \varepsilon_{jpt} \quad (2)$$

(2)式中: $space_{jt}$ 表示 t 期中国 RTA 伙伴与第三方 j 的空间关系,沿用引力模型的设定,本文所述的空间关系包含地理距离、接壤与殖民。在传统引力模型的设定下,这些变量是不随时间变化的,但考虑到中国 RTA 的生效时期不同,因此经由中国 RTA 伙伴构建的空间关系是时变变量。其中, $RTA_dist_{jt} = (\sum_k CHNRTA_{kt} \times dist_{jk}) / CHNRTA_num_t$, $RTA_contig_{jt} = \max_k \{CHNRTA_{kt} \times contig_{jk}\}$, $RTA_col_{jt} = \max_k \{CHNRTA_{kt} \times col_{jk}\}$ 。 $CHNRTA_num_t$ 为 t 期中国 RTA 伙伴数量。以上三个指标分别表示 t 期第三方 j 与中国 RTA 伙伴之间的平均地理距离(取对数)、与任一中国 RTA 伙伴是否接壤、是否存在殖民与被殖民关系。

$demand_{jt}$ 表示 t 期中国 RTA 伙伴与第三方 j 的需求关系,本文使用进口相似度衡量第三方 j 与中间方 k 之间的需求关系。 $RTA_ISI_{jt} = (\sum_k CHNRTA_{kt} \times ISI_{jkt}) / CHNRTA_num_t$,其中, ISI_{jkt} 为 t 期第三方 j 与中间方 k 的进口相似度指数, RTA_ISI_{jt} 表示 t 期第三方 j 与中国 RTA 伙伴之间的平均进口相似度。参考胡玫和郑伟 (2019) 对修正后出口相似度的构建方法,构建双边的进口相似度指数 $ISI_{jkt} = \sum_{p=0}^n [I_{kpt} / I_{kt} + I_{jpt} / I_{jt}] / 2 \times [1 - |(I_{kpt} / I_{kt} - I_{jpt} / I_{jt}) / (I_{kpt} / I_{kt} + I_{jpt} / I_{jt})|]$,其中, I_{kpt} 、 I_{kt} 分别表示 t 期中间方 k 对 p 产品的进口额与 t 期中间方 k 的总进口额, I_{jpt} 、 I_{jt} 分别表示 t 期第三方 j 对 p 产品的进口额与 t 期第三方 j 的总进口额。 ISI_{jkt} 的取值范围在 $[0, 1]$ 之间,数值越大说明第三方 j 与中间方 k 的进口结构越相似,对同类型产品具备相同或近似的需求偏好。

$regular_{jt}$ 表示 t 期中国 RTA 伙伴与第三方 j 的制度关系,本文使用经济风险指数衡量经济体间的制度关系。 $RTA_ICRG_{jt} = (\sum_k CHNRTA_{kt} \times ICRG_{jkt}) / CHNRTA_num_t$,其中, $ICRG_{jkt} = |ICRG_{jt} - ICRG_{kt}|$ 为 t 期第三方 j 与中间方 k 的经济风险指数之差的绝对值, RTA_ICRG_{jt} 表示 t 期第三方 j 与中国 RTA 伙伴之间的平均制度差异,该指标越高表示第三方 j 与中国 RTA 伙伴的平均制度差异越大。

RTA_dep_{jt} 表示 t 期中国 RTA 伙伴与第三方 j 的 RTA 规则关系。 $RTA_dep_{jt} = (\sum_k RTA_dum_{jk} \times RTA_dep_{jkt}) / RTA_num_{jt}$,其中, RTA_dep_{jkt} 表示 t 期第三方 j 与中间方 k 之间 RTA 的深度变量, RTA_dep_{jt} 表示 t 期第三方 j 与中国 RTA 伙伴的平均深度变量。与 $CHNRTA_dep_{jt}$ 相比, RTA_dep_{jt} 的均值略低,但最大值更高,说明中国生效 RTA 的整体质量虽略高于 RTA 伙伴与第三方的协定质量,但对标最高水平 RTA 的压力仍然存在。

$\beta_2 - \beta_5$ 分别衡量了由中国的 RTA 伙伴与第三方 j 的空间、需求、制度与 RTA 规则变化对中国与第三方贸易的影响,表示中国生效 RTA 的溢出效应在空间、需求、制度和规则上的扩散形式,也表示以 RTA 伙伴为桥梁,中国生效 RTA 衍生的次生影响。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主要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lnexport</i>	中国对第三方的出口贸易流量	4.8377	3.0128	0.0010	17.9141
<i>RTA_dum</i>	第三方与中国是否存在共同 RTA 伙伴	0.5583	0.4966	0	1
<i>RTA_num</i>	第三方与中国存在共同 RTA 伙伴的数量	3.6737	5.0130	0	20
<i>CHNRTA_dep</i>	中国与第三方共同 RTA 伙伴的平均深度	0.4875	0.2181	0	0.7777
<i>RTA_dep</i>	第三方与中国 RTA 伙伴的平均深度	0.4132	0.3709	0	0.9379
<i>RTA_dist</i>	第三方与中国 RTA 伙伴的距离	0.4858	0.1559	0.0911	0.9268
<i>RTA_contig</i>	第三方与中国 RTA 伙伴是否接壤	0.0854	0.2795	0	1
<i>RTA_col</i>	第三方与中国 RTA 伙伴是否存在殖民关系	0.0658	0.2479	0	1
<i>RTA_ISI</i>	第三方与中国 RTA 伙伴的需求差异	0.4560	0.0683	0.0306	0.5794
<i>RTA_ICRG</i>	第三方与中国 RTA 伙伴的制度风险差异	0.1242	0.0655	0.0618	0.7930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估计结果

表 2 汇报了基准回归的结果。第(1)、(2)列显示 *RTA_dum* 与 *RTA_num* 的系数显著为负,而第(3)列显示 *CHNRTA_dep*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尽管中国与第三方存在共同 RTA 伙伴抑制了第三方的出口贸易,但中国与共同 RTA 伙伴的协定深度却对中国与第三方的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贸易转移理论,在未区分 RTA 深度的情况下,中国与第三方之间存在共同 RTA 伙伴,或共同 RTA 伙伴的数量越多,引发中国与 RTA 伙伴、RTA 伙伴与第三方之间的关税下调,而在中国与第三方之间设置了歧视性关税,不利于中国与第三方之间的出口贸易;而单独考察 RTA 异质性特征后,中国生效的深层 RTA 却能对第三方贸易产生贸易溢出,且 RTA 深度越大,促进作用越强。以上结果证实了假说 1。进一步考虑 RTA 可能存在的滞后影响时,第(4)列显示 *CHNRTA_dep* 对当期、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第三方贸易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深层 RTA 通过对多个经济体间的制度约束与规则协调对第三方贸易具有长期的积极影响。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i>RTA_dum</i>	-0.1769*** (0.0095)			
<i>RTA_num</i>		-0.0205*** (0.0018)		
<i>CHNRTA_dep</i>			0.7506*** (0.0259)	0.1716*** (0.0244)
<i>L.CHNRTA_dep</i>				0.1280*** (0.0219)
<i>L2.CHNRTA_dep</i>				0.3097*** (0.0266)
<i>constant</i>	4.9365*** (0.0053)	4.9130*** (0.0067)	5.0822*** (0.0126)	5.7151*** (0.0169)
年份	FE	FE	FE	FE
第三方	FE	FE	FE	FE
产品	FE	FE	FE	FE
N	2 366 818	2 366 818	1 321 449	986 936
<i>adj.R²</i>	0.6676	0.6675	0.6998	0.7010

注:***、**、*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产品层面的聚类标准误。下表同。*CHNRTA_dep* 仅在 *RTA_dum* 与 *RTA_num* 非零时取值,因此样本量相对减少。

表3报告了纳入中间方 k 与第三方 j 空间、需求、制度和 RTA 规则联系的回归结果,表示 RTA 的溢出效应具有空间、需求、制度和 RTA 规则上的扩散形式。

表3 扩散形式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i>RTA_dum</i>	-0.2910*** (0.0108)			
<i>RTA_num</i>		-0.0358*** (0.0015)		
<i>CHNRTA_dep</i>			0.7572*** (0.0278)	0.8029*** (0.0286)
<i>RTA_dist</i>	-0.6287*** (0.1065)	-1.4478*** (0.1108)	-1.2794*** (0.1352)	-0.9052*** (0.1333)
<i>RTA_col</i>	-0.1559*** (0.0177)	-0.2621*** (0.0191)	-0.1027*** (0.0257)	-0.0698*** (0.0256)
<i>RTA_contig</i>	0.0383*** (0.0124)	0.1315*** (0.0111)	0.0586*** (0.0110)	0.0616*** (0.0109)
<i>RTA_ISI</i>	2.3785*** (0.0893)	2.2557*** (0.0899)	0.2765** (0.1157)	0.4659*** (0.1154)
<i>RTA_ICRG</i>	-0.5682*** (0.0390)	-0.5811*** (0.0388)	-0.3043*** (0.0494)	-0.3683*** (0.0491)
<i>RTA_dep</i>				0.8898*** (0.0412)
<i>constant</i>	4.6650*** (0.0740)	5.0973*** (0.0782)	5.8616*** (0.0956)	5.1738*** (0.0971)
年份	FE	FE	FE	FE
第三方	FE	FE	FE	FE
产品	FE	FE	FE	FE
N	1 550 773	1 550 773	927 430	920 012
<i>adj.R</i> ²	0.6682	0.6680	0.7039	0.7041

表3中,*RTA_dist*的系数显著为负、*RTA_contig*的系数显著为正,*RTA_col*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当第三方与中国 RTA 伙伴的地理距离越近或存在接壤关系时,随着对 RTA 伙伴的出口贸易增加,出口商可以充分利用 RTA 伙伴与第三方的地理优势,节省向第三方市场出口的交通、物流、运输等成本,有助于扩大对第三方的出口贸易;而当第三方与中国 RTA 伙伴存在殖民与被殖民关系时,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社会矛盾、信仰和习俗等会在 RTA 伙伴与第三方市场间形成隐性隔阂,阻碍对第三方的出口。这些结果与 Lee 等(2023)的结论保持一致,即深度 RTA 下成员之间在空间引力因素上具有相似性。*RTA_ISI*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第三方与中国 RTA 伙伴的进口结构相似时,双方消费者对进口产品的选择偏好趋于一致,出口商通过对 RTA 伙伴的出口调整面向第三方市场的产品设计、生产和包装方式,制定迎合第三方市场偏好的销售策略等,有助于其扩大对第三方出口。*RTA_ICRG*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当第三方与中国 RTA 伙伴的经济制度差异较小时,有助于出口商为可能在第三方市场遭遇的机会主义行为、寻租、贿赂、贪污腐败等制度问题做好准备,降低事前交易成本,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贸易后的谈判与合同维护和签订的效率,降低事后交易成本,因此扩大对第三方的出口。*RTA_dep*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 RTA 伙伴与第三方的 RTA 深度有效促进了中国与第三方的出口贸易。一方面,当 RTA 伙伴与第三方存在其他生效的深层 RTA 时,RTA 伙伴与第三方在投资、知识产权与竞争政策等非歧视条款上达成协议,有助于

中国出口商间接地通过 RTA 伙伴适应第三方市场的投资规则、产权标准与竞争环境等, 扩大对第三方出口; 另一方面, 考虑到 $CHNR\text{TA}_{dep}$ 的系数也显著为正, 即当中国与第三方存在共同的 RTA 伙伴时, 以共同 RTA 伙伴为轴心的双边 RTA 深度促进了中国与第三方的贸易, 即中国深层 RTA 对第三方贸易原生和次生影响均显著为正, 并且伴随双边 RTA 深度加深, 中国与第三方的边境后制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一定的相似性, 增加了中国出口商直接进入第三方市场的概率, 促进第三方贸易。以上结果证实了假说 2。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 本文采用年份、第三方、产品三重维度的固定效应进行基准回归, 采用年份、第三方-产品组合的两重维度的固定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 后者的固定效应维度更高, 它同时控制了不同第三方、不同产品及不同第三方与产品组合下的特征。

第二, 在基准回归的样本中, 本文按照中国 RTA 的生效时间从第三方中逐年剔除了中国 RTA 伙伴, 但由于 RTA 可能在签署至生效阶段具有前置影响, 本文使用 2002—2020 年对第三方完全剔除 26 个中国 RTA 伙伴后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如表 4 所示, 与基准回归中的主要结论保持一致。

表 4 高维固定效应与调整样本范围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高维固定效应			调整样本范围		
	(1)	(2)	(3)	(4)	(5)	(6)
RTA_dum	-0.2884*** (0.0098)			-0.2926*** (0.0110)		
RTA_num		-0.0390*** (0.0013)			-0.0371*** (0.0015)	
$CHNR\text{TA}_{dep}$			0.8332*** (0.0271)			0.8552*** (0.0303)
RTA_dist	-0.5101*** (0.0984)	-1.3626*** (0.1021)	-0.9476*** (0.1281)	-0.6266*** (0.1112)	-1.5693*** (0.1160)	-0.8258*** (0.1387)
RTA_col	-0.1758*** (0.0165)	-0.2813*** (0.0177)	-0.0817*** (0.0237)	-0.1590*** (0.0179)	-0.2683*** (0.0192)	-0.0719*** (0.0256)
RTA_contig	0.0531*** (0.0111)	0.1516*** (0.0100)	0.0740*** (0.0101)	0.0276** (0.0126)	0.1124*** (0.0115)	0.0549*** (0.0112)
RTA_ISI	2.6208*** (0.0809)	2.5102*** (0.0813)	0.4277*** (0.1076)	2.4143*** (0.0913)	2.2629*** (0.0924)	0.3196*** (0.1221)
RTA_ICRG	-0.6157*** (0.0393)	-0.6403*** (0.0391)	-0.3501*** (0.0477)	-0.5764*** (0.0392)	-0.5883*** (0.0390)	-0.3837*** (0.0499)
RTA_dep			0.8780*** (0.0392)			0.8846*** (0.0432)
$constant$	4.5152*** (0.0667)	4.9735*** (0.0709)	5.2291*** (0.0921)	4.6377*** (0.0768)	5.1569*** (0.0821)	5.1832*** (0.1027)
年份	FE	FE	FE	FE	FE	FE
产品-第三方	FE	FE	FE	-	-	-
第三方	-	-	-	FE	FE	FE
产品	-	-	-	FE	FE	FE
N	1 541 623	1 541 623	914 319	1 463 607	1 463 607	847 374
$adj.R^2$	0.8477	0.8476	0.8767	0.6695	0.6693	0.7096

第三,本文采用不同的 RTA 深度指标对深层 RTA 的第三方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第(1)列汇报了使用 DESTA 数据库中的条款计数 RTA 深度的实证结果,该指标对贸易协定是否包含“全面自由贸易协定、标准、投资、服务、采购、竞争和知识产权”七项关键议题的实质性条款进行了评分计数。第(2)列汇报了根据贸易协定类型进行层级分类设计的 RTA 深度指标,借鉴 Lee 等(2023)的做法将优惠贸易协定(PSA)、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关税同盟(CU)分别记录为 1、2、3 并将该指标作为 RTA 深度的一种替代指标。第(3)一(5)列汇报了采用世界银行深度协议数据库(Deep Trade Agreements database, DTAs)中的基于 Hofmann 等(2017)构建的 RTA 深度指标、WTO-plus 条款和 WTO-X 条款的 RTA 深度指标的实证结果。以上结果均表明中国生效的深层 RTA 对第三方贸易产生了正向溢出,且沿着 RTA 伙伴与第三方的空间、需求、制度及 RTA 规则关系扩散,这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

表 5 不同 RTA 深度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lnexport				
	(1)	(2)	(3)	(4)	(5)
<i>CHNRTA_dep</i>	0.5628 *** (0.0292)	1.2371 *** (0.0434)	0.5932 *** (0.0393)	0.5989 *** (0.0275)	0.7540 *** (0.0473)
<i>RTA_dep</i>	1.0017 *** (0.0369)	0.7909 *** (0.0625)	0.8198 *** (0.0513)	1.0685 *** (0.0507)	0.5407 *** (0.0499)
<i>RTA_dist</i>	-1.0721 *** (0.1332)	-1.0732 *** (0.1357)	-0.8477 *** (0.1351)	-1.0481 *** (0.1343)	-0.8327 *** (0.1350)
<i>RTA_col</i>	-0.0212 (0.0257)	-0.1405 *** (0.0259)	-0.0377 (0.0257)	-0.0537 ** (0.0257)	-0.0489 * (0.0258)
<i>RTA_contig</i>	0.0753 *** (0.0109)	0.0574 *** (0.0110)	0.0930 *** (0.0110)	0.0741 *** (0.0109)	0.0928 *** (0.0110)
<i>RTA_ISI</i>	0.5934 *** (0.1153)	0.6182 *** (0.1158)	0.5412 *** (0.1149)	0.5476 *** (0.1154)	0.5314 *** (0.1148)
<i>RTA_ICRG</i>	-0.4254 *** (0.0487)	-0.2665 *** (0.0495)	-0.4923 *** (0.0484)	-0.3247 *** (0.0491)	-0.5320 *** (0.0483)
<i>constant</i>	5.2079 *** (0.0968)	5.2591 *** (0.1022)	5.3859 *** (0.0964)	5.0547 *** (0.1019)	5.5509 *** (0.0952)
年份	FE	FE	FE	FE	FE
第三方	FE	FE	FE	FE	FE
产品	FE	FE	FE	FE	FE
N	920 012	927 430	927 430	927 430	927 430
<i>adj.R²</i>	0.7041	0.7040	0.7043	0.7040	0.7043

第四,由于经济规模和特殊事件等可能影响估计结果,本文引入第三方 GDP 占中国和第三方 GDP 的比重以及特朗普执政作为控制变量^①。结果表明,第三方 GDP 比重越高越能促进中国对第三方出口,而特朗普上台显著降低了中国的出口贸易。加入这两项控制变量均未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深层 RTA 的第三方溢出效应保持正向显著,但通过市场和制度关系扩散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发生变化,说明这部分溢出效应一定程度上被中国与第三方的经济规模对出口贸易的直接效应所影响。这意味着即使第三方与共同 RTA 伙伴制度差

①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详细结果请见本文附录。

距较大,只要第三方经济稳定发展,中国出口商也相对更加倾向于增加对第三方的出口。

(三) 内生性处理

本文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主要源于遗漏变量,即中国与第三方之间可能存在无法观测和度量的因素导致至今尚未达成双边 RTA。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尝试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使用中国与共同 RTA 伙伴的地理距离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相邻经济体一般具有相似的社会文化和发展背景,出于贸易便利性目的缔结和加深 RTA 的动机更强,满足相关性需求(林僖、白瑞思, 2022);地理距离无法随贸易情况和时间变化发生改变,满足外生性需求。表 6 显示使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说明第三方溢出效应随中国生效 RTA 深度加深而增强。

表 6 使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结果

变量	(1)	(2)
	<i>CHNRTA_dep</i>	<i>lnexport</i>
<i>CHNRTA_dist</i>	0.6005*** (0.0003)	
<i>CHNRTA_dep</i>		1.2263*** (0.0392)
空间溢出		是
需求溢出		是
制度溢出		是
规则溢出		是
年份		FE
第三方		FE
N	920 012	
<i>adj. R</i> ²	0.0024	

注: 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与 Cragg-Donald Wald F、Kleibergen-Paap Wald F 统计量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拒绝了识别不足与弱工具变量的情形。

六、进一步讨论

(一) 基于产品监管的机制检验

深层 RTA 通过协调成员之间的规制差异促进了第三方贸易,尤其是产品的标准、合格评定、检验检疫、技术法规等监管程序。RTA 是否通过促进经济体间产品监管、标准、认证等程序的融合等效,降低国际贸易的隐形成本,从而产生第三方贸易溢出? 本文聚焦这一机制进行两步检验。

第一,检验深层 RTA 是否促进了经济体间产品监管规则的融合等效。技术性非关税措施是衡量国家(地区)产品监管严格程度的重要来源,指国家(地区)为实现政策目标(如维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避免欺诈消费者行为、确保产品质量等)而制定的产品要求以及采取的相应措施,如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措施与装运前检查和其他手续等。这些措施既包括境内生产的货物,也包括进口的货物。Nabeshima 和 Obashi(2021)使用非关税措施构建了产品监管负担指标(Additional Compliance Requirement Indicator, ACRI),评估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与本土面临非关税措施的差异,取值越高说明国际市场与本土的技术标准和监管规则差异越大。本文参考 Nabeshima 和 Obashi(2021)的方法,使用 UNCTAD

TRAINS 数据库中有 2000—2020 年非关税措施,构建年份-产品-第三方层面的综合监管负担指标^①,并进一步通过区分产品受监管措施的类型构建 SPS 监管负担型产品和 TBT 监管负担型产品。

表 7 汇报了基于产品监管负担的估计结果。中国生效的 RTA 深度与产品监管负担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深层 RTA 的第三方溢出效应在境内外监管差异较大的产品上表现更强。这意味着,中国与第三方之间虽未直接建立 RTA 联系,但通过深层 RTA 伙伴为桥梁,间接地促进了中国与第三方在产品的监管范围、程序和措施上的趋同性,导致中国出口产品面临的额外监管成本下降,受第三方重度监管产品在面向第三方出口时受益更多。对比系数大小发现,SPS 监管负担型产品的系数小于 TBT 监管负担型产品,意味着中国的深层 RTA 对面临第三方 TBT 措施监管的产品具有更强的溢出效应。

表 7 引入产品监管负担异质性的估计结果

变量	ln _{export}		
<i>CHNRTA_dep</i> × <i>ACRI</i>	0.4705*** (0.0948)		
<i>CHNRTA_dep</i> × <i>SPS_ACRI</i>		0.4560*** (0.0948)	
<i>CHNRTA_dep</i> × <i>TBT_ACRI</i>			0.4606*** (0.0947)
空间溢出	是	是	是
需求溢出	是	是	是
制度溢出	是	是	是
规则溢出	是	是	是
年份	FE	FE	FE
第三方	FE	FE	FE
产品	FE	FE	FE
N	920 012	920 012	920 012
<i>adj.R</i> ²	0.7044	0.7044	0.7044

第二,检验深层 RTA 引发的跨境融合是否减轻了实质性贸易阻碍。尽管 WTO 通过 SPS 与 TBT 协定约束各经济体确保其实施的技术性非关税措施具有非歧视性,避免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但随着各经济体实施非关税措施的隐蔽性逐步增强,部分非关税措施虽然处于 WTO 的合规程度内,却仍然违背了“非歧视”原则,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实质性阻碍。对于此类措施,WTO 成员可通过提出特别贸易关注(Special Trade Concerns, STC)提案的形式对其他成员的不合理措施提出质疑(郑休休等,2023)。本文使用 WTO-STC 数据库^②中产品是否遭受 STC 通报-提案、STC 案件数量和发起次数衡量产品的贸易关注水平,该指标取值为 1 或越大说明产品遭受了歧视性监管,面临较高的非关税壁垒,以此区别于产品监管负担,更好地辨别产品因受到外部监管而面临的贸易障碍。

表 8 为 RTA 对产品贸易关注水平的估计结果,表明深层 RTA 有效降低了产品被提案为 STC 型产品的概率,意味着提高规则标准实际上能够促进产品在境外接受合理、可预期的检

①数据来源: <https://trainsonline.unctad.org/home>。

②数据来源: <https://tradeconcerns.wto.org/en>。

验审查,减轻出口阻碍,因此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监管规则应当具有稳定性、一致性和非歧视性。进一步的结果表明深层 RTA 降低了 STC 的案件数量和发起次数,与以上结论保持一致。这些结果证明了假说 3。

表 8 RTA 对产品贸易关注水平的估计结果

变量	STC 虚拟变量	STC 案件数量	STC 发起次数
<i>CHNRTA_dep</i>	-0.0090** (0.0041)	-0.0236*** (0.0063)	-0.1265*** (0.0455)
空间溢出	是	是	是
需求溢出	是	是	是
制度溢出	是	是	是
规则溢出	是	是	是
年份	FE	FE	FE
第三方	FE	FE	FE
产品	FE	FE	FE
N	920 012	920 012	920 012
<i>adj.R</i> ²	0.4123	0.4240	0.3744

(二) 基于行业与重点条款的异质性分析

与浅层 RTA 相比,深层 RTA 倾向于在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合作等相关问题上做出更为全面的规定,并且伴随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的到来,RTA 中越来越多的条款已经渗透到 ICT 之中,促进各成员在相关行业中的标准统一。因此,行业中的技术水平可能对 RTA 第三方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引入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进行交互项检验^①,结果如表 9 所示。表 9 表明深层 RTA 的溢出效应在高技术和 ICT 行业中保持显著,而对于低技术和中技术行业却并不显著,说明深层 RTA 的高标准规则和国际深度合作的重心主要集中于技术水平更高的行业,因此深层 RTA 的溢出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行业技术水平越高,促进作用越强。

表 9 基于行业分类的估计结果

变量	<i>lnexport</i>			
	低技术	中技术	高技术	ICT
<i>CHNRTA_dep</i> × <i>industry</i>	0.4534 (0.3861)	0.0476 (0.2832)	0.8528*** (0.2768)	0.8408*** (0.1880)
空间溢出	是	是	是	是
需求溢出	是	是	是	是
制度溢出	是	是	是	是
规则溢出	是	是	是	是
年份	FE	FE	FE	FE
第三方	FE	FE	FE	FE
产品	FE	FE	FE	FE
N	33 704	33 704	33 704	37 794
<i>adj.R</i> ²	0.8896	0.8894	0.8896	0.8940

注:*** 代表 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调整为行业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①本文根据 OECD 公布的 ISIC3 与 ISIC4 行业技术分类识别低技术、中技术、高技术行业和 ICT 行业,请见:<https://www.oecd.org/industry/ind/stanstructuralanalysisdatabase.htm>。

由于不同条款对境内规则的覆盖程度不同,对各成员履约义务的执行强度和灵活性也有所不同,可能造成深层 RTA 的第三方效应存在差异,本文结合 WTO-plus 与 WTO-X 的重点条款进行详细讨论。其中本文选取关税减让、服务、标准、SPS、TBT 五项旨在推动深度贸易自由化的 WTO-plus 条款,选取知识产权、投资、资本流动、非贸易议题(包含腐败、环境、劳工)四项旨在有针对性地改进成员边境后制度的 WTO-X 条款。通过协议文本是否包含以上某项条款的实质性内容分别构建九项具体条款的深度指标,并使用具体条款的深度指标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深层 RTA 中包含以上九项具体条款均能促进第三方贸易,在 WTO-plus 和 WTO-X 条款上基本不存在显著的差异^①。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认为 RTA 因其条款异质性对第三方产生了不同于贸易转移的新型影响,围绕深层 RTA 的第三方溢出效应进行了综合分析;使用 2002—2020 年中国的产品出口数据,结合 RTA 伙伴与第三方存在的空间、需求、制度和 RTA 规则联系梳理了溢出效应的扩散形式,全面考察了中国深层 RTA 对第三方出口贸易的原生和次生影响;基于产品维度对深层 RTA 第三方溢出效应进行机制检验,从监管融合的角度厘清了 RTA 对国际规制协调和降低贸易阻碍的有效性;最后结合行业与条款特征对 RTA 的溢出效应进行重点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RTA 对中国与第三方之间的出口贸易因 RTA 的异质性产生差异化影响。其中,以设置歧视性关税为主的浅层 RTA 抑制了中国对第三方的出口贸易,而注重形成国际贸易共同制度的深层 RTA 具有国际公共产品属性,对中国与第三方的出口贸易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且 RTA 深度对溢出效应具有放大作用。第二,中国的生效 RTA 通过 RTA 伙伴与第三方之间的空间、需求、制度和 RTA 规则联系扩散了深层 RTA 的福利溢出,RTA 伙伴与第三方之间存在边境接壤、进口结构越相似、生效 RTA 深度越大,对第三方贸易的正面溢出越强,而 RTA 伙伴与第三方之间存在历史殖民关系、地理距离越远、制度风险差异越大,对第三方贸易的抑制作用越强,以上内容反映了以 RTA 伙伴延伸而来的中国深层 RTA 的次生影响。第三,从机制检验来看,深层 RTA 促进了受到第三方重度监管的产品的出口,而降低了产品遭受歧视性监管的概率,即深层 RTA 通过国际规制协调有效缩小了国际监管差异、推动了国际监管环境的融合与稳定,对第三方贸易产生正外部性。从行业的异质性特征来看,高技术行业与新兴的 ICT 行业比其他行业更容易受到深层 RTA 溢出效应的影响;另外从具体条款来看,深层 RTA 中涵盖的 WTO-plus 条款和 WTO-X 条款均对第三方贸易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的结论能够为中国建设高水平自由贸易区网络,扩大制度型开放提供一定的参考。整体而言,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低迷,旨在促进经济体间贸易规则制度一致的深层 RTA 成为其突破外贸瓶颈、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工具,中国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加快 RTA 提质升级、重质重量地发展 RTA 布局,推进自身 RTA 规则向更高水平、更高标准的方向发展。加强顶层设计,通过对接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全面、系统、稳定地破除国内制约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制度阻碍,以扩大制度型开放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体来看,中国在进行制度型开放的过

^①详细结果请见本文附录。

程中既要学习和借鉴国际规则,又要主动输出制度理念,立足已有的 RTA 布局加强对接高水平经贸合作伙伴,逐步建设基于全球视野下的符合中国实际需要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自由化趋势的新型 RTA 网络。一方面,中国需要重视 RTA 中监管与技术等具体规则发展,学习借鉴国外先进规则、标准和管理技术,着力加强国内的制度建设,推动国内规则规制与国际接轨,优化国内监管规则和管理体系,提高国内规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降低出口产品和行业,尤其是技术型产品和行业遭受实质性贸易阻碍的概率,提高出口的稳定性,巩固贸易大国地位;另一方面,高度关注 RTA 伙伴的区域合作战略与贸易规则演变,发展经贸网络和制度建设更加完善的区域合作对象,通过 RTA 伙伴向外缔结其他贸易协定,逐步传播和扩散中国的规则诉求与制度导向,推动“中国式”制度方案与世界互联互通。同时,在开展具体的 RTA 谈判时,面对分歧较大、协调难度较高的谈判对象,可以采取“近点路径”的策略,结合对方现有的 RTA、地理空间、需求类型和制度环境等特征,尝试与对方的深层 RTA 伙伴、接壤国家和地区、需求和制度近似的国家和地区达成 RTA,以此为桥梁获取出口经验、加强与对方的贸易联系,争取谈判时间、降低谈判难度。

参考文献:

1. 陈迁影、刘志中, 2024:《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化与中国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国际贸易问题》第 5 期。
2. 杜莉、董玥, 2022:《高水平 FTA 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基于总深度及知识产权条款深度的研究》,《产经评论》第 4 期。
3. 韩剑、王璐、刘瑞喜, 2022:《区域贸易协定的环境保护条款与外贸绿色发展转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4. 韩剑、郑航, 2022:《区域深度贸易协定与跨境政府采购: 协定条款异质性的视角》,《经济研究》第 6 期。
5. 胡玫、郑伟, 2019:《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经济问题》第 2 期。
6. 林僖、白瑞思, 2022:《自由贸易协定缔结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第三国效应的研究视角》,《世界经济研究》第 10 期。
7. 铁璞、黄建忠、徐美娜, 2021:《第三方效应、区域贸易协定深化与中国策略: 基于协定条款异质性的量化研究》,《经济研究》第 1 期。
8. 王黎莹、姬科迪、赵春苗, 2022:《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一带一路”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研究》,《技术经济》第 7 期。
9. 郑休休、刘青、赵忠秀, 2023:《对华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国家经济安全》,《国际经济评论》第 1 期。
10. 周念利、陈寰琦, 2020:《RTAs 框架下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数字贸易效应研究》,《世界经济》第 10 期。
11. Baier, S. L., J. H. Bergstrand, and R. Mariutto. 2014.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Revisited: Distinguishing Sources of Interdepende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2(1): 31–58.
12. Baier, S. L., Y. Yotov, and T. Zylkin. 2019. “On the Widely Differing Effec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Lessons from Twenty Years of Trade Integ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6: 206–226.
13. Baldwin, R. E. 2014. “Multilateralising 21st Century Regionalism.” *Global Forum on Trade: Reconciling 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in a Post-Bali World*, No. 286980.
14. Chen, M. X., and A. Mattoo. 2008. “Regionalism in Standards: Good or Bad for Trad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41(3): 838–863.
15. Dür, A., L. Baccini, and M. Elsig. 2014. “The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troducing a New Datase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9: 353–375.
16. Freund, C. 2011. “Third – country Effects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The World Economy* 33(11): 1589–1605.
17. Hofmann, C., A. Osnago, and M. Ruta. 2017. “Horizontal Depth: A New Database on the Content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7981.
18. Horn, H., P. C. Mavroidis, and A. Sapir. 2010. “Beyond the WTO? An Anatomy of EU and US Preferential

- Trade Agreements.” *The World Economy* 33(11): 1565–1588.
19. Kohl, T., S. Brakman, and H. Garretsen. 2016. “Do Trade Agreements Stimulate International Trade Differently? Evidence from 296 Trade Agreements.” *The World Economy* 39(1): 97–131.
20. Lee, W., A. Mulabdic, and M. Ruta. 2023. “Third-country Effects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 Firm-level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40(C), 103688.
21. Mattoo, A., A. Mulabdic, and M. Ruta. 2017. “Trade Creation and Trade Diversion in Deep Agreement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8206.
22. Morales, E., G. Sheu, and A. Zahler. 2019. “Extended Grav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6(6): 2668–2712.
23. Musila, J. W. 2005. “The Intensity of Trade Creation and Trade Diversion in COMESA, ECCAS and ECOWA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14(1): 117–141.
24. Nabeshima, K., and A. Obashi. 2021. “Impact of Regulatory Burden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59, 101120.
25. Panagariya, A., and R. Findlay. 1996. “A Political-economy Analysis of Free-trade Areas and Customs Union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Reform: Essays in Honor of J. Bhagwati*. Edited by R. Feenstra, G. Grossman and D. Irwin, 265–87. MA: MIT Press.
26. Ridley, W. 2018.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ird-country Trade: 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the New Multilateralism.” Discussion Papers in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18–03.
27. Viner, J. 1950. *The Customs Union Issue*. New York: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Third-party Effect of Deep Trade Agreements: “Trade Diversion” or “Trade Spillover”

Li Xiao and Han Jian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rules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 a great number of provisions that touch on domestic regulations within contracting parties have shaped new channels that affect third-party trade, posing challenges to the classic theory of trade divers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China’s RTA network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RTAs and the depth on China’s third-party trade using China’s export product data from 2002 to 2020.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eep RTAs have generated a new type of spillover on third-party trad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rade diversion, and spreads through the spatial, demand, institutional, and RTA connections between RTA partners and third parties. These spillover effects originate because deep RTAs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 regulatory rules between countries, reduce substantive obstacle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have a public interest in contributing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are significantly reflected in WTO-X and WTO-plus provisions, particularly in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deep RTAs from a third-party perspective, providing new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insights for China to benchmark international high-standard rules and expand institutional openness.

Keywords: Deep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Third-party Effect, Trade Diversion, Spillover Effect

JEL Classification: F13, F14, F15

(责任编辑:惠利、陈永清)